

中國人民大學

Народ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Китая

農業經濟教研室

Кафедра экономики сельск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農 業 經 濟

Экономика сельск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第 一 編

社會主義農業的發生與發展

Отдел I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и развитие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сельск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第四章 全盤集體化及在其基礎上消滅富農階級

Тема 4 Сплошная коллективизация и на её основе ликвидация кулачества как класса

北京 一九五三年 ★ г. ПЕКИН, 1953 г.

第四章 全盤集體化及在其

基礎上消滅富農階

第一節 斯大林的集體化理論是

列寧合作社計劃底繼續和發展

蘇聯在共產黨和它的領袖斯大林同志的領導下，實現了列寧的合作社計劃。在蘇聯農業的這種偉大改造中，黨所依靠的是經濟發展的客觀法則，而首先是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的法則。正如我們在前面已經指出過的，集體農莊、機器拖拉機站、蘇維埃農莊的建立是這種客觀經濟法則的具體表現形式。斯大林同志在其天才著作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對於這一點作了極全面和極具有說服力的闡述。

斯大林同志指出：『蘇維埃政權的特殊作用，是由下列兩種情況來說明的：第一，蘇維埃政權不是以另一種剝削形式去代替一種剝削形式，如像以往革命中的情形那樣，而是消滅了任

何剝削；第二，由於國內缺乏任何現成的社會主義經濟的萌芽，蘇維埃政權當時必得在可以說是「空地上」創造新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

這個任務無疑是困難而複雜的，是沒有先例的。然而，蘇維埃政權光榮地完成了這個任務。但是，它之所以完成了這個任務，並不是因為它似乎消滅了現存的經濟法則，「制定」了新的經濟法則，而僅僅是因為它依靠了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這個經濟法則。」（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人民出版社中文版，第五頁。）蘇維埃政權依靠這一經濟法則實行了工業中生產資料的公有化，把土地收為國有，使之變為全民的財產，並因此而消滅了剝削制度。蘇維埃政權在實行列寧的合作社計劃時，用實行農業中農民基本生產資料集體化及使之變為社會主義集體（集團）財產形式的方法達到了上述生產資料的公有化。『如果沒有這個法則，不依靠這個法則，蘇維埃政權是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務的。』（同上，第五——六頁）

斯大林同志在與托洛茨基——布哈林等資本主義復辟分子進行鬥爭中，捍衛了列寧的合作社計劃。他向前發展了這個計劃，創立了具有實際改造力量的農業集體化的理論，並實現了這個理論。同時，斯大林同志又制定了從社會主義逐漸過渡到共產主義時期中，進一步發展集體農莊生產的途徑，以及把集體農莊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水平的途徑。

斯大林同志在發展列寧的合作社計劃時，在這方面加入了許多新的東西：

第一，他全面地研究了關於農村中社會主義經濟的集體農莊形式問題；

第二，指出了在現階段上，集體農莊建設的基本和主要環節是農業勞動組合，它是一種最正確和最能為農民所瞭解的形式，這種形式使得集體農莊莊員有可能把個人利益和他們的公共利益結合起來，把集體農莊莊員的個人利益適應於公共利益；

第三，論證了從限制和排擠富農的政策過渡到新的政策——在全盤集體化的基礎上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

第四，闡明了機器拖拉機站的意義：它是按社會主義原則改造農業，並由社會主義國家幫助農業和農民的據點。

斯大林同志繼續發展了關於集體農莊的作用問題：它是改造農村舊的結構底中堅。他毫不倦怠地研究了在組織上經濟上鞏固集體農莊的一整套辦法。斯大林同志在其所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指出了從社會主義逐漸過渡到共產主義時期中集體農莊發展的途徑，這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一個新的、極其重要的貢獻。

斯大林同志所創造的集體化理論和該理論在蘇聯的實現是有着全世界歷史意義的。該理論中所奠定的原理現在已成爲各人民民主國家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指導原則。

斯大林同志根據列寧關於必須從小農經濟過渡到大的集體農莊底指示，全面地研究了關於農村中社會主義經濟的集體形式問題。斯大林同志捍衛了並繼續發展了列寧關於集體農莊的社會主義性質、關於集體農莊之較小農經濟和大資本主義經濟的優越性底學說，研究了關於集體

農莊所有制在各個發展階段中的意義和作用問題，以及其他許多關於集體農莊建設的問題。斯大林同志全面地研究並探討了關於集體農莊形式和在目前發展階段上集體農莊的勞動組合形式的優越性問題。

斯大林同志所研究的關於集體農莊各種形式的問題，關於農業勞動組合是集體農莊在目前發展階段上主要形式的問題，是對集體化理論具有非常重要意義的新貢獻。

前面已經談到，革命後的頭幾年，主要是在國有化了的地主土地基礎上組織了高度公有化的複雜的集體農莊形式——農業公社和勞動組合。在恢復時期和實行全盤集體化以前底年代中，是以最簡單的形式——共耕社來組織新集體農莊的，共耕社在農民經濟實行大規模集體化的初期是集體農莊的主要形式。由此可見，在全盤集體化的前夕，曾有三種主要的集體農莊形式：共耕社、農業勞動組合和農業公社。這些集體農莊形式之間的區別在於生產社會化底程度的不同：共耕社是公有化的最低階段；在農業勞動組合中，雖然最重要的生產資料已完全實行公有化，但莊員仍保有小規模的個人副業；而在公社中，生產和公社成員生活供應的整個過程則完全都已實行社會化了。

當集體農莊轉入大規模的建設時期，關於選擇最適合和最有效的集體農莊建設形式問題便有了更實際的意義。斯大林同志澈底地解決了這個問題，他擁護農業勞動組合。關於這方面，斯大林同志指出：『我們黨政治戰略底最大長處之一，就是他善於在每一個時機中選出整個運

動底基本環節，抓住這個環節，便能把整個鍊條拖向一個總的目標去解決任務。」（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莫斯科中文版，第四〇九頁。）在決定集體農莊建設底各種形式時，農業勞動組合便是基本的環節。

共耕社，由於還沒有實行生產資料的公有化，所以不能成爲這種環節。由於共耕社只有一小部份生產資料實行公有化，這一點使得在組織集體生產和分配集體農莊收入方面，都產生了巨大的缺點。斯大林同志認爲共耕社「是集體農莊運動中業已過去的階段」。農業公社不能成爲集體農莊建設的主要形式，首先是因爲農業公社爲數不多，它們在集體農莊運動中還是個別現象；其次是因爲農業公社不僅把全部生產實行了社會化，而且把分配也實行了社會化，所以把它作爲主要形式來組織的條件還沒有成熟。在技術較低、缺乏組織勞動和經營全部公有經濟的經驗的條件下，農業公社中生產和分配的完全社會化非但不能證明自己是正確的，且反而產生了一系列破壞集體農莊的組織和破壞集體農莊經濟的鞏固的缺點。農業勞動組合則沒有這些和其他的缺點。它最適合於生產條件，最適合於順利地解決穀物問題和在組織上和經濟上鞏固集體農莊的任務。斯大林同志在研究了關於集體農莊的各種形式問題之後，把農業勞動組合作爲集體農莊在目前發展階段上的主要形式而提出了。斯大林在一九三〇年三月曾指出：「在現今時機中，集體農莊運動底基本環節，集體農莊運動底主要形式，即現時必須努力抓住的一環，就是農業勞動組合。」（同上，第四一〇頁）

農業勞動組合的公有經濟是主要的、起決定作用的經濟。爲了符合這一點，在農業勞動組合中便把最主要的生產資料和集體農莊莊員的勞動都實行了公有化，土地則集體使用。可是在農業勞動組合中容許莊員有小規模的個人副業。因此在農業勞動組合中，住宅、個人的小牲畜和家禽、餵養個人使用的小牲畜所必需的建築物等並不實行公有化，而留作集體農戶個人使用。從農業勞動組合的公共可耕土地中分給每個集體農莊農戶的一小塊供個人使用的屋旁園地（小菜園，小菓園），其面積爲自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公頃。在農業勞動組合中，生產社會化底這種性質和程度是最適合於鞏固和發展集體農莊公有經濟的任務和集體農莊莊員的利益。斯大林在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上總結發展農業勞動組合底經驗時，指出了這種集體農莊形式底決定性優點。他說道：

『現在大家都承認，勞動組合在現今條件下是唯一正確的集體農莊運動形式。這是完全明白的；因爲第一，勞動組合把集體農莊莊員底個人日常生活利益與他們的公共利益正確配合起來；第二，勞動組合很恰當地把個人日常生活利益適應於公共利益，因而便於利用集體主義精神來教育昨天的個體農民。』（同上，第六二一頁）

在農業公社中則與此不同，它並沒有顧到各社員底個人日常生活利益，並沒有把它與公共利益結合起來，而是利用公共利益作藉口來維護小資產階級平均主義的利益。由於這種情況，於是便把原有的農業公社改組成爲勞動組合。斯大林同志指出，這當然不是說農業公社是一種

根本用不着的集體農莊形式，也不是說，農業公社不是集體農莊運動底最高形式。將來它會有它的地位，並會在農業勞動組合成長和發展的基礎上發展起來。將來的農業公社是在技術更發達和產品極豐富的基礎上產生出來的。斯大林同志指出：『現今的農業公社是在技術不很發達和產品不充足的基礎上產生出來的。因此現今的農業公社也就實行了平均主義辦法，而很少顧到社員們底個人日常生活利益……。將來的農業公社是要從發展了的豐裕的勞動組合中長成的。將來的農業公社是在勞動組合田場上和農場中有了豐富的穀物、家畜、家禽、蔬菜及其他種種產品的時候，在勞動組合中附設有機械洗衣坊、新式廚房、食堂、麵包廠等的時候，集體農莊莊員看見從農場方面領取肉類和牛奶是比自己飼養乳牛和小家畜便宜些的時候，集體農莊莊員看見在公共食堂中用膳，向麵包廠領取麵包，向公共洗衣坊領取乾淨衣服是比自己料理這種事情方便些的時候產生出來的。將來的農業公社是在技術更發展和勞動組合更發展的時候，在產品十分豐富的時候產生出來的。這在什麼時候才會呢？當然不是很快就會有。但這是一定會有的。』（同上，第六二二——六二三頁）

勞動組合發展到將來的農業公社底過程是逐漸的，是以斯大林同志所指出的條件底創造速度為轉移的。可是在現今發展階段上，農業勞動組合是主要的形式，其進一步的鞏固和發展是集體農莊建設底最重要任務之一。斯大林同志關於集體農莊形式及其發展的學說是辯證唯物主義底方法在集體農莊建設問題中運用的範例。

斯大林同志闡明了機器拖拉機站底意義，認為它是按社會主義原則改造農業並由社會主義國家幫助農業和農民的據點。斯大林同志在總結舍夫琴科蘇維埃農莊底生產經驗時（這個蘇維埃農莊曾用按合同條件以蘇維埃農莊底拖拉機為隣村農民耕種土地的方法組織過生產上的幫助），提出了建立機器拖拉機站底主張。

在農民經濟大規模實行集體化以前底年代中，農業所得到的農業機器被用來組織了國營的和合作社的租用站。租用站給予了貧農和中農以按優惠條件使用機器的便利，並且促進了轉入土地共耕的過程。此外，以頗大一部分拖拉機和農業機器撥給既有的機器協社和集體農莊，以供共耕土地之用，同時還會經組織過集體農莊之間的拖拉機隊，以幫助正在實行集體化的農民進行生產。烏克蘭舍夫琴科蘇維埃農莊就是首先組織這種幫助形式的蘇維埃農莊之一。一九二七年，這個蘇維埃農莊組織了為周圍農戶提供生產服務的拖拉機隊。這個生產幫助底嘗試在第一年中便產生了顯著的效果。農民在致消息報的信中反映了這一點。他們在信中說：『我們是舍夫琴科村、克拉辛村、加里寧村、「紅光」村及「旭日」村的移民謹向蘇維埃政權深致感謝，感謝它大大幫助我們恢復了我們的經濟。原先我們大多數都是貧農，沒有馬匹，也沒有農具，我們無法耕種我們所領到的土地，不得不按只取一部分收成的條件把它租給老戶富農去耕種……』斯大林：在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關於中央委員會政治工作的總結報告，人民出版社版，第三五頁。其次，農民說到一九二七年烏克蘭蘇維埃農莊聯合會曾向他們建議以拖

拉機耕種他們的土地來代替國家給予他們的貸款，這件工作也已由舍夫琴科蘇維埃農莊底拖拉機隊來完成了。農民用以下的話來描述這種生產幫助的結果：『現今我們已沒有一畝敵土地是荒廢不用或出租給別人了。我們這裏沒有一個貧農不是在幾畝憩息地上種有冬麥的。我們看見用拖拉機進行的工作之後，已不願再經營貧農的細小農業了，所以我們已決定要成立用拖拉機耕作的公共農莊，這裏不會有單個的農民小塊莊稼。』（同上，第三六頁）

斯大林同志對於蘇維埃農莊給農民以生產幫助的生產經驗作了很高的評價。在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他指出了：『同志們，這樣的例子愈多愈好，那時就可以遠遠推進農村集體化事業。』（同上。）根據這個幫助農民生產的經驗，斯大林同志揭明了加強國家對農業的領導和幫助農民過渡到社會主義發展道路上去的巨大可能性。

第十五次黨代表大會提出了農業集體化的任務，根據這次大會的決議，成立了大批利用國家和合作社資金所組織起來的拖拉機隊和拖拉機站。到了一九二九年春，在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底主要穀物區，已組織了五十四個合作社的拖拉機隊，它們和蘇維埃農莊的拖拉機隊加在一起共有一千五百架拖拉機。到了一九三〇年春，在中央穀物收購局的系統內已擁有三百八十六個機器拖拉機隊和機器拖拉機站，集中了八千五百九十三架拖拉機。在機器拖拉機隊和機器拖拉機站底活動區域內（這些機構主要分佈在穀物區），以特殊的速度實現了農民經濟的集體化。斯大林同志根據組織廣大機器拖拉機隊和機器拖拉機站網底肯定經驗，於一九二九

年在聯共（布）中央四月全會上發表演說，指出：『……必須擴大機器拖拉機站網，藉以幫助農民熟習新技術，並使勞動集體化……。』（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莫斯科中文版，第三三二頁）

但是，在掌握新技術和予農民以生產幫助的事業中起過巨大作用的合作社拖拉機隊也曾有過重大的缺點，這些缺點阻碍了全部機器拖拉機發揮其高度的生產效能。其主要缺點就是大部分拖拉機隊的規模很小和領導工作缺乏組織，這些缺點往往造成無人負責的現象。生產經驗證明了，最好的形式是由統一系統來領導其生產活動的大規模的獨立企業——機器拖拉機站。

在『關於組織機器拖拉機站』的決議中（一九二九年六月），政府認為必須過渡到『……普遍設立機器拖拉機站，以作為使個體小農戶過渡到大規模集體農莊的主要途徑之一。』

到一九三〇年春，已成立了一百五十八個機器拖拉機站，其所服務的集體農莊為一萬一千六百個。以後機器拖拉機站就被組織成為替集體農莊服務的國營大企業了。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聯共（布）中央在其決議中，給機器拖拉機站的本質下了一個明確的定義，決議中說：『……機器拖拉機站是經羣衆考驗的、由蘇維埃國家在高度技術基礎上組織大規模集體農業的一種形式。在這種組織中，集體農民羣衆對於建設自己底集體農莊所表現的主動精神和無產階級國家在組織上和技術上對他們的幫助與領導得以最完善地結合起來。』

機器拖拉機站是徹底的社會主義類型的國營企業。它們是根據與所服務的集體農莊間的合

同關係來組織其生產活動的。像國營大企業一樣，機器拖拉機站使全部農業機器都得到高度生產上的利用；它們是國家領導集體農莊的重要樞杆。機器拖拉機站不但在實現小農經濟集體化方面起着很大的作用，而且在組織上、經濟上和政治上鞏固集體農莊也起着很大的作用。

機器拖拉機站更廣泛和更深入地把它生產服務普及到集體農莊的生產中去，它成為集體農莊進行社會主義擴大再生產的決定性力量。

斯大林同志在其所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進一步發展了關於機器拖拉機站對於提高和發展集體農莊生產所起的作用問題。他在研究一些經濟學家（薩寧那、溫什爾）認為必須把集中在機器拖拉機站的基本生產工具出售給集體農莊，歸其所有的建議後，指出了這一建議的缺乏根據，同時並闡明了機器拖拉機站在發展集體農莊生產中的巨大作用。斯大林同志指出：『當然，國家是把小農具出售給集體農莊的，依照農業勞動組合章程和憲法，這是可以的。但是不可以把小農具和像農業機器站的機器那樣的農業基本生產資料，或者，例如，像那也是農業基本生產資料之一的土地相提並論呢？顯然，是不可以的。其所以不可以，是因為小農具絲毫也決定不了集體農莊生產的命運，可是像農業機器站的機器以及土地這樣的生產資料，在我國當前的條件下，是完全可以決定農業的命運的。』（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人民出版社，第八一——八二頁）

斯大林同志也注意到下列情況：即一九三〇年初一部分集體農莊突擊隊員提議把機器拖拉

機站出售給集體農莊，其試行的結果表明了這一措施是不妥當的。『……集體農莊運動進一步的增長和集體農莊建設的發展，使集體農莊莊員以及領導工作人員都最後地確信，把農業的基
本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手中，集中在農業機器站手中，是保證集體農莊生產高速度增長的唯一方法。

我們大家都慶幸我國農業生產的巨大增長，穀物、棉花、亞麻、糖蘿蔔等等生產的增長。這種增長的源泉是什麼呢？這種增長的源泉就是現代技術，就是許許多多為這一切生產部門服務的現代化機器。這裏的問題，不僅在於一般的技術，而是在於技術不能停止不前，它必須繼續日新月異地改進，舊的技術必須作廢，代之以新技術，新的再代之以最新的。不這樣做，我國社會主義農業的突飛猛進就是不可思議的，無論豐富的收穫，無論豐足的農產品，也都是不可思議的。但是，要把幾十萬架車輪式的拖拉機作廢，代之以履帶式的拖拉機，把幾萬架陳舊了的聯合機作廢，代之以新的聯合機，以及例如，為技術作物製造新的機器，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要負擔幾十億的支出，這些支出非經過六年到八年之後不能完全收回。即使我國的集體農莊是百萬富翁，它們負擔得了這樣大的支出嗎？不，負擔不了，因為它們沒有力量負擔要在六年至八年之後才能收回的幾十億的費用。這種支出只有國家才負擔得了，因為國家，並且只有國家才負擔得起因在六年到八年之後才能收回這筆費用而受到的這種損失。』（同上，第八二——八三

在這些原理中，斯大林同志深刻地揭明了機器拖拉機站作為國營企業對發展集體農莊生產所起的決定作用和領導作用。斯大林同志也指出了所以不能把機器拖拉機站出售給集體農莊的另一原因是由於這樣就會擴大生產資料的商品流通範圍，不僅不能使集體農莊所有制接近全民所有制的水平，反而使它離開全民所有制更遠。

由於在集體化過程中農民羣衆的轉變，由於我國各主要地區全盤集體化底實現，斯大林同志在總結農村中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時，製定了布爾什維克黨進攻富農的新原理，並創立了由限制富農和排擠富農的政策，進到在全盤集體化的基礎上消滅富農階級的新政策底原則。斯大林同志是作為偉大的辯證唯物主義者解決了這一任務的。

斯大林同志在其關於這一問題的著作中指出，為要過渡到這一新政策，就必須在農村中有一定階級力量底對比，就必須為社會主義生產來代替富農生產創造物質前提。在從限制富農和排擠富農底政策，過渡到消滅富農階級底政策時，如不把這些因素估計在內，是不會有肯定的結果的。限制富農剝削趨向的舊政策，是希望在允許富農作為一個階級暫時存在的情況下排擠個別的富農隊伍。在基本農民羣衆未轉到集體農莊方面來以前，這種政策是唯一正確和可能的政策。但是隨着農民經濟的進入大批（全盤）集體化，階級力量的對比也發生了改變。進入全盤集體化是不可能用基本農民羣衆的簡單地與和平地加入集體農莊的方法來實現的，事先，它

必然要在農民與富農之間展開大規模的鬥爭。馬克思列寧主義教導說，剝削階級是不會自動讓出自己陣地的，是不會自動離開的，他們只有在殘酷的階級鬥爭中才被消滅掉。農業底全盤集體化意味着基本農民羣衆已穩固地走上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已走上了與反對集體化並破壞集體農莊的富農進行大規模鬥爭的道路。全盤集體化和蘇維埃農莊建設的發展同時也意味着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已建立了足能代替富農生產的物質力量。斯大林同志根據對階級力量對比的全面分析，正確地規定了由限制和排擠富農政策進入在全盤集體化的基礎上消滅富農階級政策的時機。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間所作的論蘇聯土地政策底幾個問題的演說中，全面地論證了這一轉變的必要性和時機。他在這一演說中指出：『進攻富農是要認真幹的事情……。進攻富農是要擊破富農，並消滅這個階級……。進攻富農就是準備去實際行動，並把富農打得一敗塗地，打得他再也不能翻身。』（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莫斯科中文版，第三九七頁）在同一演說中，斯大林同志也指出了當時已具備這些可能性的事實。他說：『現在我們已有充分的物質基礎來打擊富農，來打破富農的反抗，消滅富農階級，並用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來代替富農生產了。』（同上，第三九八頁。）斯大林同志的關於從限制和排擠富農的政策進入在全盤集體化的基礎上消滅富農階級的新政策的這一論證，對建設社會主義農業來說，是有着理論上和實踐上的巨大革命意義的。

斯大林同志與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敵對理論和觀點進行了堅決的鬥爭，進一步發展了列寧

底合作社計劃，創立了集體化的理論。

反對黨的關於社會主義農業改造措施的布哈林——托洛茨基資本主義復辟分子，竭力用各種反馬列主義的敵對理論（如集體農莊運動中的『平衡』論，『自流』論等）來使這一鬥爭加劇。他們爲了要保護農業中的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並在反對集體農莊的鬥爭中力圖以理論武器來武裝富農，就宣傳所謂國民經濟各部門的『平衡』論。正如斯大林同志所駁斥的，這種論調與馬克思主義毫無相同之處。

斯大林同志說：『不難了解：這個理論底客觀目的是要保持個體農民經濟底陣地，用『新的』理論武器把富農分子武裝起來反對集體農莊，破壞集體農莊底陣地。』（同上，第三七九頁。）這種機械的『平衡』論，是和馬克思列寧主義再生產的理論根本相矛盾的。當蘇聯大規模的、集中的社會主義工業已循着擴大再生產的道路發展時，在農業中佔優勢的全部小農經濟不僅不能實現每年的擴大再生產，而且即使要實現簡單的再生產也常常成爲不可能。

反馬克思主義的『平衡』論底目的是要在兩種不同基礎上保持國民經濟的發展，這必然會使國民經濟趨於崩潰，使社會主義建設遭受失敗，而使資本主義得以復辟。斯大林同志說：『可是，只要打開馬克思主義寶庫，拿出再生產論來和各部份彼此平衡論對比一下，就可把這後一個理論打得粉碎了。』（同上，第三七九頁）

所謂『自流』論，對於農村中的社會主義建設來說，也具有同等敵對的性質。這一『理

論」的擁護者們企圖把資本主義發展的規律機械地搬到蘇維埃經濟的經濟條件上。他們從以下這一原理出發：即在資本主義條件下，農村是自發地、自流地跟着資本主義城市走的，是按照資本主義城市底形像和模樣改造着的；於是他們就推論，既然在資本主義下是如此，那麼在蘇維埃經濟制度下，農村也可以自流地跟着社會主義城市走，也可以自發地按照社會主義城市底形像和模樣來改造自己。這種反科學的理論底目的是要分散人們參加農村社會主義改造事業底精力，而任憑這一事業趨於自發和自流，其結果就必然會使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遭受失敗，而資本主義得以復辟。斯大林同志在揭露這種反馬克思主義的敵對理論時，指出：『毫無疑義，社會主義城市對於小農鄉村的領導作用是偉大而無可估量的。正因為如此，所以工業就具有改造農業的作用。可是，單靠這一因素，是否已足夠使小農鄉村自動跟着城市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呢？當然是不夠的。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農村是自流式的跟着城市走的，因為城市資本主義經濟和農民小商品經濟，基本上是同類的經濟。當然，小農商品經濟還不是資本主義經濟。可是，它基本上是和資本主義同類的，因為它倚據於生產資料私有制。』（同上，第三八二頁。）不能給在蘇維埃經濟條件下的城市社會主義生產和鄉村小農生產也作出這樣的結論。不能把這兩種經濟看作是基本上同類的經濟。列寧曾明白指出：『當我們還生活在小農國家裏時，資本主義在俄國比共產主義有更堅固的經濟基礎。』從這裏可以明白看出：社會主義建設問題的『自流』論，是反科學、反列寧主義的敵對理論。斯大林同志在評述『自流』論時，說